

廖平 選集

李耀仙 主編



上

巴蜀書社

廖平 選集

李耀仙 主編



上

巴蜀書社

1998 · 成都

獻 詞

是對孔子、儒家、經學作總結的時候了

張 秀 熟

不拘守古人治經的成說，不堅持自己的新說，通過繼續研究，不斷對自己過去的見解提出新的見解，由一變直到六變，這是廖季平先生一生治學的最大特點，實在是中國第一人。

廖先生的全部著作瑕瑜互見，薰蕕雜出，但把它作為一個整體，正顯示出中國過去的“十三經”的演變情形：從《尚書·堯典》起直到宋明理學，汗牛充棟，五花八門，實在已成為五色斑斕的大渾水池。什麼是經學？什麼是儒家？什麼是孔子抑或非孔子？無一人能作出完全的解答。經學的真面目，儒家的真面目，孔子的真面目，儒家有誰敢過問？只有廖季平的“六變”，才把它突出來。但是廖先生也只能生活在這個渾水池中，他的學術成就就在於把這一渾水的“渾”連他也不自覺地顯示了出來，而這樣也就宣告了經學的終結。

但是問題不止如此，廖先生的經學六變不是問題的結束，而是到他才把問題攤開。孔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從漢代起在中國統治了兩千多年，一談到中國的舊文化，占主流的也只是儒家。它的本身，具有優良的和極其落後的兩方面。中國民族經歷無數的坎坷和折磨，而能够巍然立國數千年，這一方面是由於儒家學說具有優良的因素。中國在古代曾對人類社會作了許多有益

的貢獻，明代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曾經居於世界的前列。然而近代以來，却逐漸落後，一天天地走下坡路。建國以後，毛澤東同志還時刻警惕中國處於“一窮二白”的狀況。現階段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黨中央一再指示，至少還要經過半個多世紀，才能達到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個病根，也是中國的文化問題，追根溯底，不能不說它與自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以來就占據中國思想統治地位的孔子和儒家學說有密切的影響。因此，我們現在的責任，應該如毛澤東同志所指示，我們要對孔子作一個總結。這個總結也要現在才作得出來。

我們現在研究古籍，研究經學，研究儒家思想，必須把研究的指導思想引向到這樣的高度，才有路徑。這一個光輝的使命，正落在現在的有關學者和專家身上。而且這個工作並不難，因為我們不是要求像過去的經師、儒生一樣，如蛀蟲一般埋身於故紙堆裏，畢生精力就只陷於訓詁名物和考證故實的微觀之中。自然，我們尊敬他們對古籍研究做了不少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不過現在如果仍然按照舊路子來繼續治經，那就不免走入了一條死胡同。因此，我認為，為了對孔子，對儒家思想，對經學作一個總結，大學的文科各系和理論工作者應該通力合作，成立專門組織，固定專人，集思廣益，以一定的時間，來把這件工作緊抓一下，一定是能够取得新成績的。這個問題若不趕上，那末對中國幾千年來文化發展的歷史就弄不清楚。因此這件工作非做不可。

李耀仙先生主編的《廖平選集》出版，我認為作為研究資料是很有益的。我對廖先生的著作僅在幾十年前窺探過一二，不敢涉及內容，謹寫此作為獻詞。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總 目 錄

(上)

獻 詞	張秀熟 (1)
《廖平選集》(上册)內容評介——代序	李耀仙 (1)
今古學考.....	(29)
古學考.....	(111)
知聖篇(正、續)	(167)
孔經哲學發微.....	(287)
經話(甲、乙)	(393)
六變記.....	(537)

《廖平選集》（上册）內容評介——代序

李 耀 仙

（一）

廖平，字季平，號六譯老人，四川井研人。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生，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中進士，得官龍安府教授。民國建立後，出任成都國學專門學校校長有年，五四運動前夕患中風症，右手痙攣不能作書，隨即退居鄉里，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病卒。幼時鈍而好學，困而求知，苦思強記，卒能蜚譽士林。生平著述甚豐，計成一百一十八種，已刻九十七種，未刻二十一種，其中有關經學為多，醫學次之。季平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經學家與思想家，其在學術上之重大成就，是他的經學六變思想。

廖平能够走上矢志經學的道路，是和當代兩個著名人物對他提携和誘導有關：一個是張之洞，另一個是王闓運。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把他的試卷從廢紙簍中拾出來，拔為府學第一名，次年以優異成績補廩，又牌調尊經書院受學，使他能感受到一點乾嘉學派的學風，為他日後的功名學業打下較為堅實的基礎；可是張之洞也誤了他，對他的治學方向時加干涉，使他的經學思想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王闓運接長尊經書院，把常州學派新學風的信息帶來

四川，使他得悉治今文經學的蹊徑；可是他並未完全隨着業師走，他的業師以治《公羊》擅長，而他却是從治《穀梁》入手成家。

或問：廖平經學六變思想是怎樣一回事？這是指他的經學思想的六次變化。前人治經，由垂髫而至黃髮，豈無易其初衷？雖名士宿儒在所不免。然而所變論調之徹底，次數之頻繁，影響之劇烈，却無過廖平。關於他的經學六變思想內容，作者將次第予以評介。

廖平的經學一變，不是變他自己的經學思想，而是變前人的經學思想，換句話說，是變自東漢鄭玄以來，在經學史上佔支配地位達千餘年的“混合今古”的經學思想。這裏所謂的“今”，是指今文經；所謂的“古”，是指古文經。今文經和古文經本是經學上兩個不同的派別，各有各的家法，自鄭玄開以今注古之風，就亂了套，成了“混合今古”，使後世學人無由得見今古文經的本來面目了。

廖平經學一變是如何變的呢？他就是把“混合今古”轉變為“平分今古”的經學思想。所謂“平分今古”，就是正確地分辨今古文經，並給予它們以平等的待遇。

照廖平看來，過去的人知道今古文經之分，是由於所用本子不同（今文經是漢人用當時文字——隸書——寫成的本子，古文經是為漢人發掘出來未遭秦火所焚的古文字寫成的本子）的倒很多；至於知道由於所處地位的不同（今文經俱立學官，古文經盡在民間）的就少了；知道由於所出地區的不同（今文經皆在齊魯，古文經出自燕趙）的更少了；知道由於所說制度的不同（今文經以《王制》為宗，古文經奉《周禮》為主）的，不說許慎、鄭玄諸人無此見識，就連西漢大儒亦不明斯旨了。廖平以制度為

標準來分辨今古文經，確是他在經學史上的一大創見。

接着，廖平認為：今古學禮制的不同，“實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這是由於“孔子初年問禮，有‘從周’之言”；“至於晚年，哀道不行，不得不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補偏”，“書之《王制》，寓之《春秋》”，“所謂‘因革繼周’之事也”。據此，他得出結論說：“予謂‘從周’為孔子少壯之學，‘因革’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以上均引自廖平《今古學考》）既然如此，人們對今古文經，就應該給予平等的待遇。廖平以今古學之分實為孔子壯年與晚年不同之言，也是為前人所未道的。

廖平“平分今古”之說，均見其所著《今古學考》一書中。他在此書內，除以《王制》為今學之主，《周禮》為古學之主外，還提出了幾部基本的今古文經和幾部今古相雜的經，至於其他經的今古文之分，則是後來附會而成的。他說：“《孝經》為古學，《春秋》為今學，《論語》為今古雜。……至於《孝經》有今學，《春秋》有古學，《論語》有今古兩派，此皆後來附會流派，孔子當時不如此分別也。”他還說：《春秋》三傳中，“《穀梁》全同《王制》”，《左傳》“以古禮說《春秋》”（但時有緣經異說），此兩書為今古學根本，合《王制》、《周禮》共四家，都“為今古之正宗，同異之原始。……然後先師各囿所習，推以說《易》、《書》、《詩》、《論語》、《孝經》，凡此五經今古之說，皆後來附會之談，非本義也。”他又說：“《戴記》（指《大小戴禮記》）兩書中諸篇自有今古。”廖平在此書中，說今學主經，取《王制》，不取《公羊》；認為“《公羊》時參古學”，未若《穀梁》“全同《王制》”，不得列為今學之根本。這一說法是和常州學派所倡導今學的旨趣與蹊徑是不

相同的。

季平於《經學初變記》中，曾自道其“《今古學考》排難解紛，如利剪之斷絲，犀角之分水，今古學派始能各自成家，門戶森嚴，宗旨各別。”其自信如此，但他在數年後就自變其主張了。

在經學初變時期，廖平還寫了《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起起穀梁廢疾》一卷，《釋范》一卷，《穀梁集解糾繆》二卷。《古義疏》頗知家法，對劉向、尹敏等兩漢經師遺說搜錄頗勤，得使古義流傳後世，其書價值在鍾文烝《穀梁補正》之上。又於治《穀梁傳》中，發其所說禮制，與《王制》全同，不似《公羊傳》之時參古學，遂使《穀梁》的地位頓時提高。《釋范》、《糾繆》兩書，對范寧《集解》的學無師法，以臆解經，又輒喜攻傳，開後世舍傳從經之弊等，揭露無餘。《起起廢》一卷，於何休所撰《穀梁廢疾》的“自尊所習（《公羊》），同室（與《穀梁》同為今文）操戈”；鄭玄所撰《起穀梁廢疾》之“既不習《穀梁》，乃謬託主人攻何（休），使本義愈湮”；皆一一加以糾正，堪稱《穀梁》功臣。

廖平的經學一變，發端於一八八三年中赴京會試來往途中的潛心冥想，終於於一八八六年著《今古學考》。自一八八七年起，則轉入經學二變時期。他的經學二變，即所謂“尊今抑古”說，從一八八七年——一八九七年，前後經歷了十年的時間。他的“尊今抑古”說也就是對他前期所倡“平分今古”說的自駁，其代表著作是他於一八八八年所著的《知聖篇》和《闢劉篇》。

所謂“尊今”，就是尊今文經。廖平認為：今文經各經俱備，皆為孔子改制而作，其言的“微言大義”，可傳於後世。所謂“抑古”，就是壓抑古文經。廖平認為：古文經皆有作偽迹

象，雖託名本之周公，實為劉歆及其弟子所偽造，無可遵循。

廖平之所以要從“平分今古”變為“尊今抑古”，關鍵在於他對《周禮》一書態度的改變。他原在主“平分今古”時，曾以《王制》為今學之主，《周禮》為古學之主，一為孔子晚年之言，一為孔子壯年之學，二者可以和睦共處。可是此一局終不可長處久安，而致引起雙方搏鬥。其導火線當溯源於他在讀《續皇清經解》時，就曾受到了劉逢祿、魏源、特別是邵懿辰諸人著作的影響，於古學為周公所訂有所不安。及至他從讀《漢書·王莽傳》載劉歆《頌莽功德文》中，見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一語，就開始懷疑《周禮》為周公手訂的真實性，並初步揣測這部書是劉歆作偽的，引起了他著《闢劉篇》的動機，成為他的經學思想從“平分今古”轉向“尊今抑古”的開端。

敘述廖平的“尊今抑古”說，按行文次第來說，理當先從“尊今”方面講起；但為了使讀者便於瞭解他的思想線索，又需從“抑古”方面講起。

廖平“抑古”的代表著作——《闢劉篇》與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在內容上都有密切的關係，因而出現了究竟誰影響誰的問題。這個問題，雙方都有依據，爭論不休，未成定論。筆者不打算列舉雙方所持論點的依據，來評定其得失；僅從對廖、康二氏著作成書時間及其內容的介紹中，來解決這個問題。

廖平的《闢劉篇》和《知聖篇》的初稿都成於一八八八年，但常加修改，並未及時刊行。前書的增訂本改名為《古學考》，一八九四年作記，一八九八年始付梓；後書雖作序於一八八八年，却遲到一九〇二年纔出版。而康有為的《偽經考》早於一八九一就施之梨棗，《改制考》亦在一八九七年問世。如果單從廖康二

人著作刊行的時間來看，康書是在廖書之前的。又廖平《古學考》有兩處涉及康書內容的：一處是贊揚康長素（有為字）“秦焚六經未嘗亡缺”的主張，另一處則直接提到《新學偽經考》的書名；而有為的《偽經考》則從未提到廖平其人與《關劉篇》其書。如果單從廖康二人著作是否標明有採納別人主張來看，廖著有之而康書則是沒有的。但這祇是問題的表面現象。根據廖平的自述，季平曾於一八八九年底將所著的兩篇給有為看過，還相互討論書中的內容，並有旁人見證；顧頤剛先生亦說，他曾在康家看到過《知聖篇》的原稿。而更重要的還在：從廖著兩篇的增訂本中，猶可溯其原意，從中窺見廖著影響康書的痕跡。

筆者曾著有《廖平的〈古學考〉與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一文，對如何從《古學考》來找《關劉篇》原意，下過一番考訂工夫，這裏祇簡述從考訂中得出的成果。

《關劉篇》有以下幾個要點：（一）、古學始於劉歆，成於東漢。“劉歆取《佚禮·官職篇》刪補孱改，以成《周禮》。劉歆弟子乃推其書以說《詩》、《書》、《孝經》、《論語》，此皆東漢事。”（二）、一切古經皆有作偽跡象。廖平訂為古經的，除《周禮》外，祇有《古文尚書》和《毛詩》。其他嚮為人所稱為古經的，均不是古經（如《逸禮》、《費氏易》）；或無分今古（如《爾雅》）；或本非古經（如《左傳》）；或本無古經（如《論語》、《孝經》）。（三）、古經祖周公，不祖孔子；又古經主訓詁，無師法。“哀平以前，博士全祖孔子，不祖周公。劉歆《移書》（即《移讓太常博士書》）亦全歸孔子。後來欲攻博士，故牽引周公以敵孔子。古文學家說以經皆出孔子是也。”又“古學無師承，專以難字見長。……本無師說，故不得不以說字

見長。”（四）、古學以《周禮》為主。此條係沿襲《今古學考》而來，而易以新說。言歆既改《周禮》，為求相助，其弟子遂推《周禮》之意以說《書》、《詩》、《論語》、《孝經》，其他古經乃相繼問世。（五）、古學雖始於劉歆，但與王莽政治勢力有密切關係。哀帝時，歆為《左傳》、《逸禮》、《古文尚書》、《毛詩》請立學官，移書讓太常博士，受到執政者和博士們的反對，險遭不測。到平帝時，王莽秉政，歆遂藉莽權勢，蓄意創立古學，以與博士所傳今學相對。至歆偽竄《周禮》，純為媚莽篡漢而作。（六）、《史記》有劉歆竄處；《漢書》的《藝文志》、《歆傳》、《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言經學傳授，有後人臆造，不可盡信。

上述《闢劉篇》的六個要點，對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都有影響。《闢劉篇》的（一）、（二）、（三）、（四）各要點的主張、解說，《偽經考》與之基本相同。《闢劉篇》的第二要點，把古經形成的情況講得很複雜；《偽經考》在其《漢書藝文志辨偽》一章中，則以一切古經皆為偽纂，倒是乾脆利落，一目瞭然。《闢劉篇》第五要點，《偽經考》祇取其主張，而持不同解說。《闢劉篇》不以一切古經皆為歆偽纂；《偽經考》則斷一切古經皆歆偽纂，此其不同之一。又《闢劉篇》除以《周禮》古經為歆迎合莽意而改外，並考古經作偽之淵源，追溯至歆在莽居攝前，假莽之勢，謂“五經為不全”，以攻擊博士；《偽經考》在其《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偽》一章中，則侈言歆蓄志纂孔學當遠在哀帝時，並以莽在居攝前立學官，不是歆假莽之勢以攻擊博士，而是莽獎掖歆之纂孔，此其不同之二。《闢劉篇》第六要點講得很略；《偽經考》則言之甚詳，顯示出它的史學、目錄特長。該書對《釋文》、《隋志》有關古經傳授問題寫成的兩個《糾繆》

專章，所下考訂、辨偽工夫，還得到廖平在《古學考》中的贊賞。

《偽經考》一書，確為其自己主張的，祇有三項：（一）、秦焚六經未嘗亡缺。有為著有專章，置於篇首。錢玄同先生在其《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文中，指明為該書重大發明之一。（二）、《左氏春秋》出於《國語》。（三）、《左氏春秋》是劉歆偽造的，並為其“偽竄”之始。後二者見《藝文志辨偽》中，篇幅都相當長，尤以最後一者，康氏以為發廖平所未發。廖平在《古學考》中採納了前二者的主張，特別於第一項，直接舉出了康有為的名字；但於後一者則不以為然，在其《與康有為書》中明白表態說：“足下以《左》列入新莽，則殊與鄙意相左。”

通過以上的敘述，我們對廖、康二人著作在抑古問題上，究竟是誰先影響誰？誰影響誰的作用大？都作了詳細的交代，讀者可瞭如指掌了。

現在我們進而介紹廖平尊今說的代表著作——《知聖篇》。我們今天看到的《知聖篇》，已不是廖平一八八八年的手稿本，而是他在一九〇二年出版的增訂本。據顧先生稱他在康家看到的原書稿本，經歷了五十年的時間仍未問世，怕也不復存在了。目前我們祇能憑《知聖篇》的增訂本，與《古學考》述《關劉》原意聯繫起來，益以《經話甲編》等書，以推測手稿本的原意。

《知聖篇》原意有以下幾個要點：（一）、古制簡陋，古史多神怪不經。洪荒初開，禮制簡陋。春秋時所見三皇五帝之典策，其言神怪不經，與經相歧。到孔子時，但用文教已可長治久安，故力絕神怪，以端人心而正治法。這是孔子要改制的出發點。康有為採納了這個意見，著《上古茫昧無稽考》，置於《改制考》的首篇。（二）、孔子受命改制。孔子受命改制，為素

王，此經學微言，傳授大義。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按舊制，要有天子之位，纔能議禮、制度、作禮樂；孔子雖負有天命，但有德無位（即所謂“素王”），祇能“存空言於六經”，不敢言作，託之於述。有為接受了這個主張，於《改制考》中，特撰《孔子為制法之王考》、《孔子創儒教改制考》。（三）、六經為孔子改制而作。舊說以六經為帝王之陳蹟，非也。當說：“孔子統集羣聖之成，以定六藝之制，則六經自為一人之制，與帝王相殊。故弟子據此以為賢於堯舜者遠，實見六藝美善，非古所有；以六經為一王之大典，則不能不有素王之說，以孔子為聖為王；此因事推衍，亦實理如是。”此為廖平作是書旨趣，有為受其影響，撰《六經皆孔子改作考》，作為《改制考》的中心篇章。（四）、孔子改制託古。孔子受天命，不能不作；但有德無位，不能見之施行，則以其所作，“存空言於六經，託之帝王，為復古反本之說。與局外言，則以為反（同返）古；與弟子商榷，特留制作之意。”即劉歆所謂“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是也。前說孔子受命改制，六經為孔子改制而作，西漢今文家亦嘗有說，廖平不過有所發揮而已；至孔子改制以託古方式行之，則為廖平所獨創。有為甚賞其說，在《改制考》中撰有《孔子改制託古考》與《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二篇。

在《知聖篇》舊稿中，除上述四個要點被有為採納外，尚有幾個特點未為有為所接受，或後被有為所突破其限度的。（一）、說孔子改制立教，不說諸子創教改制。有為在《改制考》中，以周末諸子同於孔子，著有《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諸子創教改制考》、《諸子改制託古考》、《諸子爭教互攻考》等篇，以闡述其旨。廖平後來讀到此書，頗不謂然，在增訂本中云：“或以

為諸子皆欲傳教，人思改制，以法孔子，此大誤也。今考子書，皆春秋四科流派。”廖平的子書出於孔門四科說，不如有為諸子並起創教說近於實際；但他以改制為微言，意在“知聖”，甚為切題，而有為《孔子改制考》中許多篇章却做成《諸子改制考》去了。（二）、說六經皆為孔子改制而作，不專主《春秋》。以廖平說“制作知命”，不以獲麟為斷；說“六經旨要以制度為大綱，取於《王制》，其意甚顯。此為廖平改制說所異於兩漢今文家者。此一主張似未為有為所接受，至少在他的《六經皆為孔子改制所作考》中沒有反應。（三）說《公羊》經義，祇取其“存三統”，而不涉及“張三世、異內外”之說。上述三者，即何休說《公羊》之所謂“三科”。廖平於何氏說僅擇善而從，而不盡取其義。其《知聖》原意說：“三統以尚書為本，乃經學大例”，意在說明“三統”乃孔子損益歷代禮制，以為百王立法，並非歷代之真實禮制。而有為在《改制考》中，除取《知聖》之“通三統”外，又進而自說“張三世”。何休《公羊解詁》：以孔子所見為太平世，所聞為昇平世，所傳聞為據亂世。而有為於《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中，則反其意而行之，以孔子所見為據亂世，所聞為昇平世，所傳聞為太平世；並以此為孔子託古改制，即孔子將其政治理想寓寄於堯舜文王的行事中，得為世人所循，即可撥亂反正，以致太平。有為“撥亂反正，以致太平”的“三世”說要比廖平“損益古制，為後王立法”的“三統”說大大跨進了一步。廖平讀其書至此，亦暗為擊節，不覺於《知聖》增本的自注中寫道：“今已改三統不能循環者為三世進化表矣。”（四）、說孔子改制的精蘊，雖重在制度，而不言人民有自立自主之權。《知聖》原意說：“六經旨要以制度為大綱，而其辨等威，決嫌

疑，尤為緊要”，以為若此便探得孔子改制的精神了。有為却不在封建等級制前止步，在其《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中進而說：“孔子撥亂反正，託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託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這樣，就把孔子的託古改制和當時一些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人士要求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結合起來，突破了經學專為封建君主專制政體服務的界限，不是為局限於地主階級立場的廖平所能體會得到的。

我們在上面對廖平兩篇成書時間及其書中內容的介紹中，已同時將兩篇和康有為兩考的關係交代清楚了。有為的兩考，雖其骨幹命脈，得自廖平兩篇，亦確自有其優點、特點，尤以《改制考》一書，在反映時代要求這一重要問題上，足能勝過廖平一籌，有可供其學習之處。

一八九八年，廖平著《地球新義》，開始其經學思想的第三變——古大今小說，這個思想延伸到一九〇四年，經歷了七年的時間。

廖平的經學三變，是和自己的經學二變的公開決裂，也是和康有為經學思想的公開決裂。自有為《改制考》之“張三世”說出，頑固派怒斥其離經叛道。湖廣總督張之洞善窺政治風向，趕著《勸學篇》以駁之。又慮及其弟子廖平與有為思想關係太密，一旦政治失足，於他不利，遂託宋育仁轉告廖平，要他改變說經方向。廖平遂草《地球新義》，以自劾其說。戊戌維新失敗，廖平卒免於禍。其後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云：“（廖平）晚年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其實之洞於廖平，“逼”則有之，“賄”則無據，亦大可不必也。

何謂“古大今小”？“古大”者，在以古文經之《周禮》為

《大統》；“今小”者，在以今文經之《王制》為“小統”。“大統”、“小統”之分，在以疆域言（前說今古則以制度言，或真偽言）；《周禮》講皇帝疆域大，故為“大統”；《王制》講王伯疆域小，故為“小統”。

廖平曾諱言“古大今小”，始則改今古之義為“上考”、“下俟”，繼則祇言“大小”，不言今古。然其後於致江瀚書中，自詡“合覆（古）與（古）於一身”，則又大言不慚矣！

《王制》“小統”，《周禮》“大統”之說，是廖平曾將《禮記·王制》、《尚書·禹貢》、《周禮·秋官·大行人》、《周禮·夏官·大司馬》所記行事與疆域，作了一番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大意謂《王制》疆域方三千里，是三王、五伯時的疆域，面積最小，故稱“小統”；《禹貢》疆域方五千里，為五帝時一州之數，五帝各轄九州，合方一萬五千里；《大行人》疆域，九帝分司，各方九千里，合方二萬七千里，面積頗大，“大統”之稱，主要指出：《大司馬》疆域，方三萬里，是九皇的疆域。

廖平的“古大今小”說，在以《王制》治內，海外全球，屬之《周禮》，如此，則大小內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古代經書中糾纏不清的疆域問題，至此可得迎刃而解了。

如上所述，廖平的“古大今小”說，有一根本假定，即孔子在作六經時，已推測到地球甚至天體的情況（廖平還將《尚書·顧命》中的“天球河圖”解釋為天圖與九州地圖）了。孔子何能推測及此？那就是推崇孔子是“生知”（即“生而知之”），比“素王”還要高級，使得孔子由中國聖人進而到全球神聖。

廖平經學思想的前三變，先從混合今古變到平分今古，再從